

中国经典宝库



论语

仁者的教诲

王兴康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经典五经

论语

仁者的教诲

（增订本）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经典宝库



论语

仁者的教诲

王兴康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丛书由原出版者香港中华书局合法授权予本社出版

中国经典宝库

论语：仁者的教诲

王兴康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中华书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插页 5 印张 9 字数 183,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8,001—13,000

ISBN 7-5325-2203-2

B·270 定价：12.80 元

主 编 的 话

十三经对今天的不少年轻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，可是在古代这却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。汉代开始，由于儒家地位的提高，那些最能代表儒家精神的典籍，便被尊为经典，经过唐、宋两代的补充，便形成了以《诗》（《诗经》）、《书》（《尚书》）、《易》（《周易》）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等为内容的十三经。这十三种经典虽然都属于儒家的早期著作，但是由于它们代表着儒家核心的思想观点和文化结晶，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，其生命力却历久弥新。这些特点是：

一、历史悠久。十三经中多数著作的确切撰著或成书时代无法考定，可大致能够肯定的是均出现于周代至秦汉之间，时间距今都是两千年以上了。这是中国用文字记载的典籍中早期成果的精华，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。今人想要溯流追源，那是定要阅读十三经的。

二、内容丰富。十三经的内容各有侧重,有对自然现象的观察,有对社会秩序的叙述,有对历史事件的记载,有对民间文学的汇编,有对历史人物言行的实录,可以说汇含了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,其涵盖面是极为宽广的。

三、影响巨大。两千多年来,中国读书人都将十三经作为治学、立身、处世的思想知识渊藪来看待,它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道德准则,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、所有角落,它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哲学观、政治观、道德观、伦理观、文学观、历史观、宗法观、价值观等等观念,已经融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,渗入到中国国民的血液中,从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。

有人曾说,五千年中华灿烂文化的载体,主要是由十三经、诸子百家著述、二十四史和一些优秀文学著作组成的,这话很有道理。我们今天所讲的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主要也是指从上述各类典籍中汲取精华,去除糟粕。这些典籍特别是十三经,实在是一座座无尽的宝藏,足以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助益:

一、思想道德的资助。十三经所包容的思想道德观念广博而深刻,它的“天人合一”的世界观,能够启发人们很好地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,从而适应并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。它以尧、舜、文、武为楷模,主张德治和仁政,崇尚礼乐和仁义,倡导民本思想。在伦理道德上注重“五常”(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),借以维护社会秩序,处理人际关系。在自我修养上则主张磨炼人格意识,坚定言行操守,“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,“匹夫不可夺

志”，进而提出了一整套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论规范。举凡传统儒家的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经济、文化等观点，无不融汇其中。而且，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之后，历经汉、宋、明、清各代儒生的笺注解释，这种儒家思想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和发展，始终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，上自皇室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大都以此作为规范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。因此，十三经堪称传统文化的宝库。

二、历史知识的丰富。十三经中各经的成书时代有先有后，著述时间跨越数百年；而所记述内容的时域又包容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兼及秦汉，长达两千余年。在这漫长历史期间的朝代更迭、帝王轮替、礼仪典章、战争攻伐、辞说外交、学术争鸣、文学创作、文物器具等等，无不在十三经中有所记载。通过这些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可靠史料，我们可以认识那数千年历史的概貌，知道我们民族之所由来。同时，它所形成的典故，也供给我们广博的知识。

三、语言文字的培养。用古代语文著述的十三经，固然因其简古而索解为难，韩愈说《尚书》是：“周《诰》殷《盘》，诘屈聱牙”（《进学解》）；不过，十三经中却也有专门关于文字知识的一经——《尔雅》，它围绕着其他典籍对古文字作了解释，使我们得以了解有关字词的古义，读懂其他各经，并了解汉字的由来和演变。更何况，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当时就被视为学习语言的教科书，孔子曾说过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它所建造的美文学殿堂，给历代的文学发展以滋养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虽属史书，却也是文字简洁、气势磅礴的古

代优秀散文。《孟子》一书记载了孟轲及其弟子们的谈话，可它所表现的思辨与逻辑力量简直是无与伦比的，而且简明通俗、亲切动人，确为美轮美奂的散文。阅读十三经，当会增加我们的语言文字知识和增强文字表达能力。

十三经自是一座开掘不尽的文化宝藏，它必将裨助中国新文化的健康发展。而《中国经典宝库》对这座宝藏作了初步的介绍，以供深入宝藏的朋友们做点前期准备。还望读书界的朋友提出批评性意见。

魏同贤

乙亥新春于沪寓

前 言

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在历史上发生过深远的影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尽管中国曾经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迁，但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。因此，学习中国的历史与文化，研究中华民族的性格，都离不开研究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。

孔子(公元前五五一年——前四七九年)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东南)人。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，后来家世衰微，失掉了贵族的地位。由于宋国发生了内乱，孔子的曾祖父逃到鲁国避难，于是便成为鲁国人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，在孔子三岁那年就去世了，因此，孔子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。贫困的生活经历，使孔子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，增长了他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。他曾经说过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据史料记载，孔子少年时曾从事“儒”业(替人办丧事当吹鼓手之类)；二十岁以后，做过委吏(仓库管理员)和乘田(看管牛羊)。他勤奋好学，博学多能。

三十岁左右，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，有“贤人七十，弟子三千”，第一次让平民百姓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。四十七岁时，他当了鲁国的中都宰（即鲁国都城曲阜的行政长官），又任司空（主管建筑的官员）、司寇和大司寇（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）。五十三岁那年，他代理宰相三个月。后来，因鲁君接受齐国的女乐，荒废政事，孔子便离开了鲁国，带着学生周游列国，推广他的政治方案。此次出行，历时十四年，途经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共七个诸侯国。结果，七国的国君对孔子的学说大多采取了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，而孔子也未获重用。六十八岁那年，孔子回到了鲁国，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、传授古代文化的工作。他一生整理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，编纂了《春秋》，于七十三岁那年逝世。

历代帝王把孔子神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“文宣王”、“大成至圣先师”，其实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、也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。他喜欢音乐，在齐国听了一场“韶”乐（相传是帝舜时的乐曲）后竟陶醉得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；他对诗也很有研究，说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，并多次同学生一起讨论诗的内容和形式问题；他对礼制很感兴趣，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；他讲究饮食，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，但又甘于淡泊，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；他批评学生时不留情面，但又善于吸收学生的长处；他性格温和，但有时也会发急，例如，有一次他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（此人品行不端），子路很不满，逼得老师对天发誓道：“予所否者（意为：我如

有邪念),天厌(厌弃)之!天厌之!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他同学生关系融洽,经常同学生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。有一次他同几个学生一起谈论各自的志向,子路说:“愿意把自己的车马、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,用坏了也不吝惜。”颜回说:“不夸耀自己的好处,不表白自己的功劳。”最后孔子说,他的志向是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由此可见,孔子不是道貌岸然的教主,更不是天生的圣人,而是一个有志向、有个性、有感情的普通人。

至于孔子的言论,现在一般认为《论语》中的记载较为可信。《论语》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几位学生的言论和行事,全书共二十篇,五百一十二章,约两万字。这些文字,是我们今天研究孔子思想最基本的材料。

关于《论语》的成书,一般认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说法较为可信:“《论语》者,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,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,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也就是说,《论语》是一部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言行的书。这部书较为可信,因为书中没有对孔子“树碑立传”式的美化和吹捧,所记多半是事实。

书成之后,为甚么取名“论语”呢?对此诸家说法不一。一般认为,“论”是“论纂”,“语”是“语言”,因此,“论语”就是把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“论纂”起来的意思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即持此说。

《论语》的编纂,据杨伯峻先生考证,约始于春秋末年而成书于战国初年。到了汉朝,《论语》有三个版本:一

是《鲁论语》二十篇，二是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（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），三是《古论语》二十一篇（无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，而将《尧曰》中的“子张问”一章独立一篇）。当时，《鲁论》和《齐论》各有师传。西汉末年景帝时的安昌侯张禹，以《鲁论》为根据，把这两个本子融合为一，世称《张侯论》。张禹人品低下，为时人诟病，但他是成帝的老师，他的《张侯论》一经问世，便成为儒生们最推重的版本。东汉灵帝时刻成的《熹平石经》，其中的《论语》用的就是《张侯论》。直到今天，我们通常用的《论语》本子，基本上是《张侯论》的面貌。

早在汉朝初年，《论语》就被定为读书人启蒙时的必读书。自此以后，为《论语》作注的著作不胜枚举。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：一、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论语注疏》（将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和邢昺的《论语疏》放在一起）。二、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的《论语集注》。朱熹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两篇，将它们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为“四书”，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之作注。自明朝以迄清末，科举考试的试题均摘自“四书”，而考生的“代圣人立言”，又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。因此，明、清两代，“四书”（以及朱熹的注释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）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“五经”（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）。三、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。清人擅长考据，对唐、宋人的经典注疏多有不满，而《论语正义》正是这一学术风气的产物。书中广征博引，论断较为公允。在现、当代学者的著作中，程树德的《论语集释》博采众说，杨树达的《论语疏证》独辟新径，杨

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深入浅出，三书各具特色，各擅胜场。

《论语》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涉及许多社会、思想领域。本书将《论语》涉及的主要内容分为七个专题，选录有代表性的原文，将其分门别类，系于相关的专题之下。一般来说，这些文字基本上反映了《论语》全书的面貌。读者如有进一步研究孔子的兴趣，则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进而阅读全本《论语》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，同时又是争论不断、争议最多的人物。孔子的“魅力”即存在于这一对立矛盾之中。孔子身后，孟子称赞他“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”，而庄子学派撰写的《盗跖》篇则痛诋孔子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赞孔子“至圣”（见《孔子世家》），而东汉的王充则在《问孔》篇（见于《论衡》）中对孔子的许多言论多所驳难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历代的统治者尽管有时也将孔子打入“冷宫”，请他坐几年冷板凳，但绝大多数的统治者是尊孔的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，于是有人提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；一时之间，人们从孔子的《论语》中看出了满纸的“吃人”，于是便视之为封建专制主义的“武库”。然而，就在五四运动的浪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，一个以振兴、弘扬儒学为使命的学派出现了，这就是“现代新儒家”。自当时到现在，这一学派至少经过了四代人的传承（第一代：梁漱溟、张君勱、熊十力；第二代：冯友兰、贺麟、钱穆；第三代：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复观；第四代：杜维明、刘述先、蔡仁厚），其影响区域从中国大陆到港台，再到海外，然后又返回中国大陆，由此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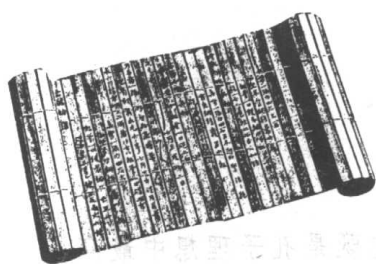
可见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，至今仍未丧失其影响现实的作用。

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，周予同先生就在《经今古文学》和《孔子》诸书中指出，我们研究孔子，必须分清“假”的孔子和“真”的孔子。这里强调的是要从历史变化的角度去研究孔子，考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，也即揭明了一种研究方法或途径。这一观点对我们今天一般的《论语》读者来说，也有所启迪。如果《论语》永远只是孔子的《论语》，而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相继变为郑玄、何晏、朱熹、康有为（康氏有《论语注》）的《论语》，那么，《论语》早就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。从孔子的《论语》不断地变为其他人的《论语》，其中正贯串了“古为今用”的基本精神，也是《论语》内在生命力的体现。

本书试图在把《论语》文字的原意传达给读者的同时，尽可能使读者从中获取现代意义的、现实意义的启示，也就是在复原“真”孔子的同时又塑造一个“假”孔子。笔者以为，一味求“真”，那是专家、学者的任务；而一味道“假”，又会使孔子变得面目全非。对一般读者来说，他们所希望的是既了解孔子的原意，又知道这些思想在今天怎样的场合会具有怎样的意义。本书的写作，即希望兼顾两者，以满足读者上述的需要；至于这一目标是否达到，那就只有请读者评判了。

目 录

主编的话	1
前 言	1
第一章 论仁德	1
第二章 论道	45
第三章 论修养	73
第四章 论处世	105
第五章 论孝悌	161
第六章 论为政	179
第七章 论教育	219
篇目索引	271



论仁德

第一章

仁，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。它既是孔子理想中最高的政治原则，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。

孔子说的“仁”，其意义非常宽泛，它包括了忠、恕、孝、悌、智、勇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等道德观念，而其最根本的涵义则是孔子说的：“仁者爱人。”因此，背离了“爱人”这一根本精神，忠、孝、信、勇等等就没有意义了。按照孔子的逻辑，有了“爱人”的道德品质，对普通人来说，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并自觉地遵循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，忠于君主，孝顺父母；对统治者来说，才能体恤下情，爱护百姓，并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，以减轻人民的负担。

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，就连对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，也仅仅说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并不肯断言颜渊已经达到了仁的标准。但是，既不知礼，又不节俭，却能辅佐齐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的管仲，孔子却许他以仁。这一点其实与孔子的一贯思想并不矛盾，因为按春秋时